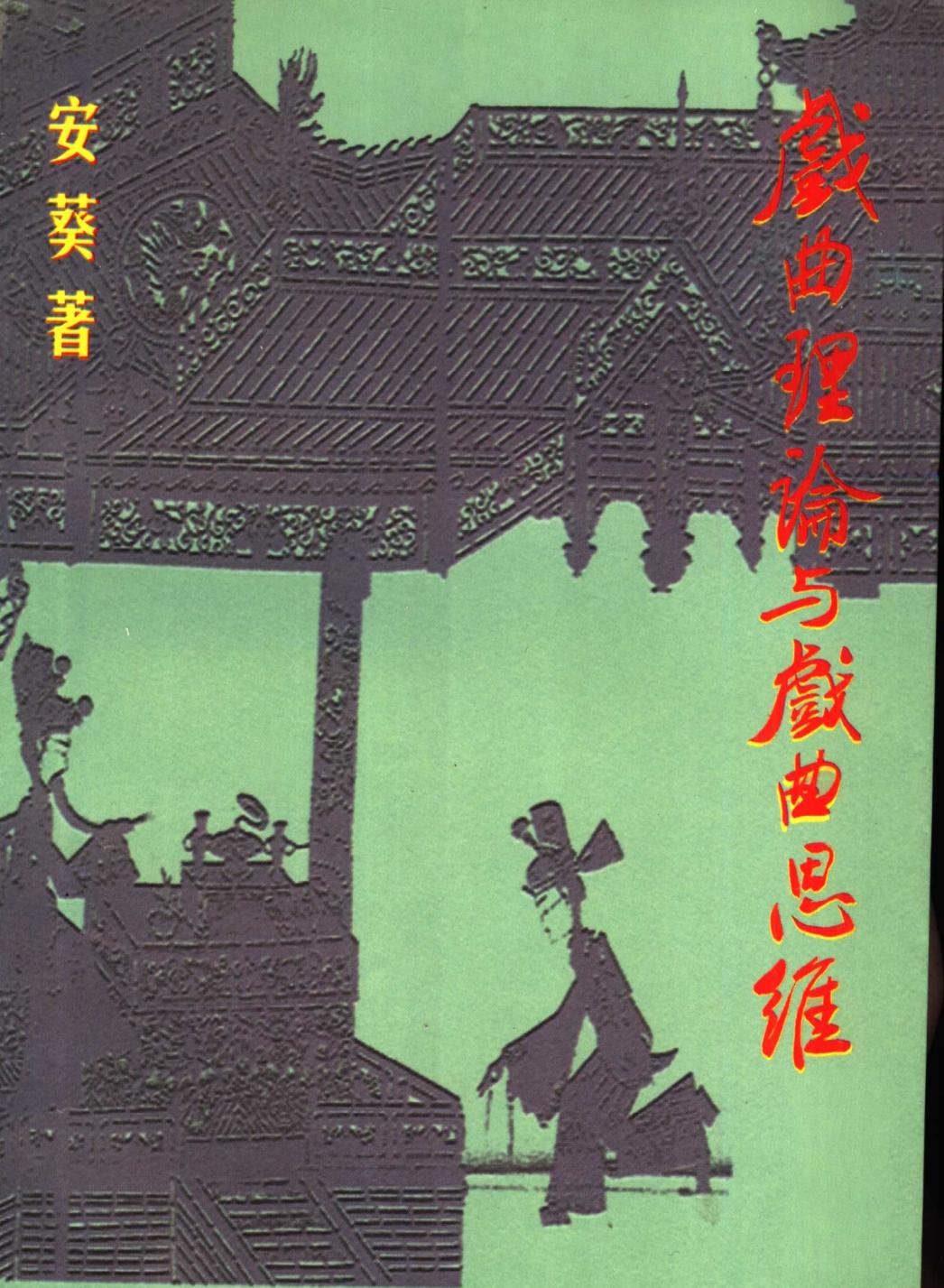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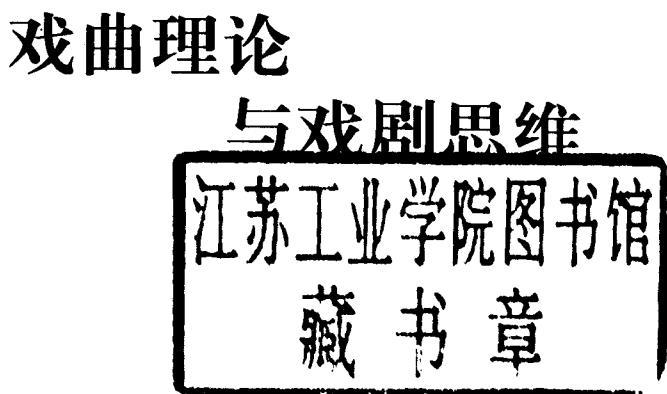


戲曲理論與戲曲思维

安葵著



中國戲劇出版社



中国戏剧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分戏剧家论、创作研究、理论思考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王国维、吴梅、梅兰芳、田汉、马健翎、张庚、郭汉城等近当代戏剧家的历史地位和贡献。第二部分从分析研究当前创作现象入手，探讨了戏曲创作的特点和规律，是作者前几部著作对戏曲创作论研究的继续深入，其中有些文章是在戏曲编导进修班上的讲稿，对创作实践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第三部分的文章对近当代戏曲发展进行了理论的总结，并对戏曲理论自身的状态与发展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是本册的一个显著特色，从事戏曲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同志会从中得到许多启示。

戏曲理论与戏剧思维

安葵 著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普瑞德印刷厂 印刷

366 千字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14.5 印张

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100 册

ISBN 7 104 01124-2/I · 455

定价： 28 80 元

前　言

这本文集收录我近年撰写的三个方面的文章，一为戏剧家论；二为创作研究；三为理论思考。按照研究对象的时代划分，则包含近代戏曲史研究和“现状研究”两方面内容。

张庚老师在他主持的《中国戏曲通史》和《当代中国戏曲》基本完成以后，就指示戏曲研究所的同志要把近代戏曲史作为一个重要研究方面。要有计划有目的地积累资料，选择专题，为编写近代戏曲史做准备。我原来研究的重点是当代戏曲，根据张庚老师指示的精神，我将研究的领域向近代拓展。

二十世纪的中国经过激烈动荡、风云变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戏曲在这一时期里也走过了曲折的历程，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面貌。因而近代戏曲史也包含着丰富复杂的内容。我重点选取了戏曲学术思想衍变这一角度进行研究。收入文集的这篇文章多数又是向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八、九十年代，举办了不少本世纪著名学者的纪念研讨活动，如王国维诞辰 120 周年学术研讨会，吴梅诞辰 110 周年学术研讨会，梅兰芳、周信芳诞辰 100 周年学术研讨会，田汉诞辰 100 周年学术研讨会等等。这些研讨会不仅是对这些戏剧家的纪念，也包含有对本世纪的学术成就、学术道路进行总结的意义。这些人联起来就可构成一部近现代戏曲学科发展史的框架。当然继承是为了发展，要发展首先需要继承，学术总是在对历史的总结中前进的。因为时间不够及其他原因，我还只写了很多几篇，对每位戏剧家的研究也只取一个角度，不是全面论述。如果有条件，我想写出一部“从王国维到张庚”这样的书来。

对于当代戏曲作家我曾出版过一本《当代戏曲作家论》。这里

收有对几位中年剧作家作品的评论,但这些作家都在发展前进之中,这些文章也不是对他们的全面评价,而主要是通过这些作品探讨当前的创作问题,因此这组文章编到“创作研究”中。这一辑另外一些文章论述了当前比较突出的创作现象,比如模式化问题等等。还有一些是根据在编导进修班讲课的讲稿整理写出的。在办进修班的过程中,我感到许多青年剧作者既需要学习基础理论,也需要学习具体的编剧技巧,尤其需要介于二者之间的的东西。即理论如何运用于实践,技巧又如何为一种艺术理想服务,这两者的结合就是要懂得戏曲思维的特点和规律。懂得了这种特点和规律,就能够思路开阔,思维活跃,灵感飞动,写出有光彩的作品。我在《戏曲拉奥孔》一书中提出这一看法,本书中的许多文章继续从不同角度论述了戏曲思维的问题。这些观点正确与否,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也恭请各位师友批评指正。

所谓理论思考也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对近当代戏曲历史和现状的论述,二是对理论批评本身的思考。新时期以来,戏曲艺术比起前三十年有了空前的繁荣,但人们的危机感却也更为强烈;戏曲理论比起前三十年来也有空前的发展,但人们也常感到困惑,所以这期间关于戏曲的前途命运、特点优势以及理论的作用等等都有很多不同意见的讨论。

关于“百家争鸣”我是这样理解的:大家各自充分发表自己的见解,就是百家争鸣,能够使大家充分发表意见的环境就是最好的百家争鸣的环境。近年有些学术研讨会各自讲自己的,较少“交锋”,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百家争鸣并不一定非要互相辩难甚至互相讨伐不可。在学术讨论中我们曾经有过的唯我正确、与我不同的便是谬误甚至毒草的做法,实在应引为深刻的教训。但争论有时也不可避免,只要以与人为善、以理服人的态度参加争论也是有益的。然而不必故意挑起争论,好像不争论就是冷清,就是学术不繁荣似的。文集中有两篇“争鸣文字”,也是受到编辑同志或别

人的“挑动”才写出的。今天重读，感到有些话是带“意气”的，但这些文章又阐明了我的一些观点，所以还是原样收入。今天这些已成历史，愿文友们相逢一笑。

这一辑中还收有几个学术会的“小结”，几篇书评和序言，以及随笔札记类的东西，因都涉及当前理论研究的一些方面和我自己的观点，所以也就不考虑形式上的整齐而都收了进来。我参加的学术活动是新时期戏曲学术活动中很少的一部分，我读的书也是新时期出版的戏曲理论著作中的很少的一部分，但从一斑看全豹，戏曲理论研究确实不断向深度、广度开拓。

在编每一本文集的时候，我都深深地感到在这些文字中凝结着许多师友的心血。剧作家、艺术家的创作给了我写作的源泉，编辑同志的启示与斧正，广大读者和学生的热情鼓励与诚恳批评，使我能够不断总结和有所提高。特别要感谢中国戏剧出版社的领导和刘建芳同志，他们对拙著的出版给予了热情有效的支持。感谢曲润海同志为本书题签，使这本小书增色。

在整理完这些文字的时候，新千年的曙光已从东方升起，我们伟大的祖国，我们的民族艺术，我们的事业，正充满希望和生机，让我们以坚定的步伐走向未来。

作者于 2000 年元旦

目 录

前言 (1)

戏剧家论

众里寻他千百度

——略论王国维戏曲研究历程 (1)

吴梅戏曲理论的贡献和对我们的启示 (13)

梅兰芳对京剧剧目建设的贡献 (24)

田汉与中国戏曲改革 (36)

马健翎在现代戏曲史上的地位 (44)

他与中国戏剧共命运

——记老戏剧家张庚 (48)

剧诗说与中国戏曲体系 (54)

试论郭汉城的戏曲批评 (69)

创作研究

寻求突破的跋涉

——试论郑怀兴的戏曲创作 (83)

澎湃的激情 深沉的思考

——读刘鹏春的剧本 (91)

雅俗共赏与“局式”	
——读李志浦剧作	(101)
常为探索长精神	
——读《齐致翔、张之雄剧作集》	(106)
值得重视的“阶段性成果”	
——读姜朝皋的剧作	(114)
读《王汝贵近作选》	(120)
历史剧创作：一种艺术思维	(123)
戏曲创作的文化视角	
——新时期二十年戏剧创作回顾	(133)
剧作的立意及立意的实现	
——广东观剧随想	(142)
美的竞赛	
——第五届中国戏剧节观感	(150)
充实而有光辉	
——获文华大奖的戏曲、话剧学习一得	(156)
共工触不周山与女娲补天	(163)
印度戏剧掠影	(167)
狮城戏曲薪火旺	(174)
第二届华文戏剧节观摩散记	(178)
《古典戏曲名著故事丛书》前言	(185)
汤显祖和他的《邯郸梦》	(188)
关于包公、《陈州粜米》和对《陈州粜米》的改编	(192)
《梁山伯与祝英台》改编后记	(198)
立意与形象	(200)

结与解	(208)
情节与意境	(216)
生活形式与舞台表现	(225)
打破创作模式	(235)
从容创作精品	(240)
几多璞玉待细琢	(244)
改好了是好戏 ——读剧本随笔	(246)

理论思考

戏曲理论在近现代的曲折进程	(253)
论近代戏曲文学的过渡性	(271)
走向现代化的中国戏曲	(281)
戏曲发展与新的综合	(293)
五十年来戏曲理论与实践	(308)
张庚剧诗说辨析 ——与施旭升先生商榷	(341)
略论当代戏曲批评	(354)
批评应是理解与发现	(362)
理论的价值何在 ——读《死与美》及其续篇	(366)
戏曲理论批评的困惑	(372)
谈戏曲现状研究	(378)
从别林斯基对《智慧的痛苦》批评错了谈起	(384)
漫话“人情评论”	(386)

比较艺术研究的实践品格	(388)
为了艺术的拓展	
——中国戏曲与话剧的相互借鉴	(396)
电视给戏曲插上翅膀	(405)
读文札记(一)	(412)
读文札记(二)	(417)
读文札记(三)	(422)
'96 东方戏剧展暨学术研讨会的意义	(426)
民间戏剧的意义和湖南的贡献	(430)
王朝闻艺术研究方法的启示	(433)
梁冰和他的绿色理论	(436)
愿把金针度与人	
——读《编剧丛谭》	(438)
金芝:边实践边“沉思”的剧作家	(442)
《陈仁鉴评传》及其作者	(445)
读《东西方戏剧文化历史通道》	(449)
《黄梅戏初论》序	(453)
《中国戏曲史》序	(456)

众里寻他千百度

——略论王国维戏曲研究历程

1913年初，刚刚步入三十七岁的王国维完成了他的戏曲史研究总结性著作《宋元戏曲史》。在序言中，他踌躇满志地写下了如下几句话：

“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其所贡于此学者亦以此书为多。”^①

这并非王国维自吹自擂，《宋元戏曲史》问世后，学术界对它的评价比王国维自己的估价更高。

梁启超说：“曲学将来能成为专门之学，则静安当为不祧之祖矣！”^②

郭沫若说：“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毫无疑问，是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璧。不仅是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且是权威的成就，一直领导着百万的后学。”^③

日本学者青木正儿说：“他（王国维）的这几种大著，以及他研究曲学的精神，不独唤起了本国学人研究曲学，而且在东瀛也惹起了不少学者来研究中国戏曲。对于此点，盐谷温氏在他的《中国文学概论讲话》第五章叙说中明明白白地说：‘……王氏游寓京都时，

①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序》，《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新1版。（后文引自此版者不另注明）

②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③ 郭沫若：《鲁迅与王国维》，《沫若文集》第12卷，并收入《中国近代戏曲文学论文集（1919—1949）·戏剧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我学界也大受刺激，从狩野君山博士起，久保天随学士、铃木豹轩学士、西村天因学士、亡友金井君等，都对斯文造诣极深，或对曲学的研究吐卓学，或竟先鞭于名曲的绍介与翻译，呈万马骈镳而驰的盛观。”^①

不独是戏曲史，即在戏曲理论方面，王国维也有卓著的建树。直到近年，人们在论述戏曲的特点时，仍认为王国维的“以歌舞演故事”说是最简洁明确的概括。

王国维为什么能取得这样高的成就？这是与他研究的态度与方法分不开的。我想起了王国维关于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说：“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蓦然回首），那人正（却）在，灯火阑珊处。”^②这三种境界也很形象地描述了王国维本人戏曲研究的艰苦历程。

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研究学问的人不可胜数，只要做出一些努力，总会有一得之见，但如王国维所说，要成大学问，却必须站得高看得远，“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只有这样的愿望还不行，必须有学识的基础。

王国维生当国难深重的时代，许多爱国之士都在寻找救国救民的出路，这也促进了学术上对外开放的要求。王国维的好友罗振玉说：“时我国兵事新挫，海内人心沸腾，予欲稍知外事，乃从友人借江南制造局译本书读之，予窃意西人学术未始不可资中学之助。时窃读焉。”^③这反映了当时中国学者的普遍心情。

① 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叙》。

② 王国维：《人间词话》。这三句词，第一句出自晏殊《蝶恋花》，第二句出自柳永《凤栖梧》，第三句出自辛弃疾《青玉案》（元夕）。

③ 罗振玉：《集蓼编》。

1898年戊戌变法时，王国维二十二岁，也是一位关心国事的热血青年，这一年他在黄遵宪等办的《时务报》馆任书记，并拜谒了康有为。与罗振玉一样，他也要“知外事”。在繁忙的事务工作之余，每天抽出三个小时学外文。在学习的过程中，他越来越被西方的哲学所吸引。他从日本人田冈佐代治的文集中看到“有引汗德（康德）叔本华之哲学者，心甚喜之。顾文字睽隔，自以为终身无读二氏之书之日矣！”为了学习西方哲学，他从田冈学英文。掌握了英文，他更勤奋地学习西方哲学、美学。对康德、叔本华、尼采等的哲学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还翻译了日本学者的《哲学概论》、《心理学》、《伦理学》、《哲学小辞典》等书。^①

王国维学习西方哲学、美学，必然地要接受西方哲学、美学的一些观点。就这些观点本身说，有的深刻，有的偏颇，王国维对这些观点从激赏，到怀疑，到部分否定，经过了曲折的过程，但重要的在于如下几方面的影响：

一、对社会人生有更深入的思考。哲学是思考世界和人生的。站到人生和社会的高度去观察戏曲，就与以往人们仅仅把戏曲看成一种文艺形式和娱乐形式大不相同。

王国维说：“《水浒传》之写鲁智深，《桃花扇》之写柳敬亭、苏昆生，彼其所为，固毫无意义。然以其不顾一己之利害，故犹使吾生无限之兴味，发无限之尊敬，况于观壮缪之矫矫者乎？若此者，岂其如汗德所云，实践理性为宇宙人生之根本？抑与现在利己之世界相比较，而益使吾人兴无涯之感也？则选择戏曲小说之题目者，亦可以知所去取矣。”^②

王国维特别赞赏元杂剧，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彼但摹写其胸

① 参看袁英光、刘寅生编：《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② 《文学小言》，发表于《教育世界》总第139号（1906年）见《王国维文集》第一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后文引自此书者不再注明）

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则流露于其间。故谓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无不可也。”^① 这就是说，王国维认为元曲是把作者真挚的感情与社会现实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真实地反映了社会人生，因此是“最自然之文学”，也便是最好的文学。

二、在理性与情感、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加深了对艺术的认识。艺术于社会的功用如何，人们往往做单一的理解。王国维研究西方哲学，在思想上产生了矛盾和苦闷，同时也感到了哲学与艺术的矛盾。他说：“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②

有人说，哲学家不懂得诗，有一定道理，如果机械地用哲学的思维方法去解释诗，则可能使人觉得味同嚼蜡。但艺术理论批评，却要求理论家既有丰富的感情，又有清醒的理性思维。对文学和哲学的双重爱好，恰恰促使王国维这两种气质一齐发展，这虽使他感到矛盾和苦闷，事实上却使他能更深入地理解艺术。

三、中西兼学，使王国维具有了辩证思维的方法。中国古代的思维方法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即注意对事物的联系和整体的把握，但也有不足。王国维接触了一些西方的学术思想之后，认为：“我中国有辩论而无名学。有文学而无文法，足以见抽象与分类二者皆我国人之所不长”。^③ 王国维吸取了西方重分析的方法之后，在中国戏曲史的研究方面便开了新生面。比如对中国戏曲的形成，多少年来，人们多重复诗降为词、词降为曲的说法，王国维第一次描述出戏曲由多种艺术发展衍变而成为“真戏剧”的轨迹。在他

① 《宋元戏曲史》。

② 《静安文集续编·自序》。

③ 《论新学语之输入》。

的论著中既有翔实的资料依据，又有严密的逻辑推理。

日本汉学家狩野直喜说：“王静安先生的伟大，就在于用西洋科学方法整理国故。”^①此说有道理，但又不完全。王国维的成功在于中西两法的有机交融。陈寅恪先生的论述就更为全面，他说：“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然详绎遗书，其学术内容与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正，……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等是也。此二类之著作，其学术性质固有异同，所用方法亦不尽符合，要皆转移一时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②

王国维对于中西二学，则有如下看法：“学无新旧也，学无中西也，……所异者，广狭疏密耳！……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动，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③

中西二学“贯串精博”就为王国维“独上高楼”架设了坚实的云梯。

衣带渐宽终不悔

人们常用“筚路蓝缕”四字形容戏曲史家治史的艰辛，“体素羸弱，性复忧郁”的王国维一直过着清苦的生活，但他研究学问的劲头从未稍减。在他短暂的一生里，在那么多学术领域，诸如哲学、文学、戏曲史、甲骨文、金文、古器物、殷周史、汉晋木简、汉魏碑刻、敦煌文献、西北地理、蒙古史等，都取得卓著成就，这是不能不令人

① 转引自《王国维年谱长编》第74页。

② 《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序》。

③ 《国学丛刊·发刊词》。

惊叹的，但我们只要考察一下王国维做学问的足迹，就可以看到他凭借的不仅是天才和灵感，而是踏踏实实，从一点一滴的积累做起。在写《宋元戏曲史》之前，他先完成了《曲录》、《戏曲考原》、《录鬼簿校注》、《优语录》、《唐宋大曲考》、《曲调源流表》^①、《录曲余谈》、《古剧脚色考》等著作。每一部著作都花费了他大量的功夫，这几个方面的研究又是他为戏曲史研究所做的必要的准备。

王国维由研究诗词进而对戏曲产生兴趣之后，首先广泛搜集戏曲剧目，完成了《曲录》的编撰。他说：“余作《词录》竟因思古人所作戏曲，何虑万本，而传世者寥寥，正史《艺文志》与《四库全书提要》，于戏曲一门既未著录，海内藏书家亦罕有搜罗者，其传世总集除臧懋循之《元曲选》、毛晋之《十种曲》外，若《古名家杂剧》等，今日皆绝不可睹。余亦仅寄之伶人之手，且颇遭改窜以就其唇吻。……余乃参考诸书并各种曲谱及藏书家目录，共得二千二百二十本，视黄氏之目（指黄文暎之《曲目》——安葵）增逾一倍。又就曲家姓名可考者考之，可补者补之，粗为排比，成书二卷。”^②后来又经进一步补充，“为书六卷，为目三千有奇。”^③ 王国维高度评价戏曲作品的价值，“论其体裁，开有明之制义，考古者征其事，论世者观其心，游艺者玩其辞，知音者辨其律”；^④ 他撰《曲录》的目的，“非徒为考镜之资，亦欲作搜讨之助”，即为写戏曲史作准备，但这准备阶段，他是那样认真，那样不避烦琐。

钟嗣成的《录鬼簿》是他撰写《宋元戏曲史》的重要资料依据，但他不是拿来就用，为了使资料更翔实可靠，他先对照《太和正音谱》、《也是园书目》、《元史》、《山房随笔》、《草堂诗余》等著述，对

① 据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曲调源流表》原稿已散失。

② 王国维：《曲录自序》，见《王国维戏曲论文集》。

③ 王国维：《曲录自序》（二），见上书。

④ 同上书。

《录鬼簿》作了细致的校勘，再得到新的版本，他又再对照校勘。在校勘的后记中王国维写道：“宣统改元冬十二月以明季精钞本对勘一过”，“校勘既竟，并以《太和正音谱》、《元曲选》复校一过，居然善本矣。”^①但他再得到未见的钞本，还要再校。“宣统二年八月，复影钞得江阴缪氏藏国初尤贞起手钞本，知此本即从尤钞出，而易其行款，殊非佳刻。若尤钞与明季钞本，则各有佳处，不能相掩也。冬十一月，病眼无聊记此。”^②从中可见，王国维为治史做准备在资料的校勘上下了多少“笨”功夫！

优人的言行散见各种古籍，史家和录者多看重优人敢于讽谏朝政。王国维则从研究戏曲史的角度，对优语广泛搜集，成《优语录》。王国维说：“盖优人俳语，大都出于演剧之际，故戏剧之源，与其变迁之际，可以考焉。”“是录之辑，岂徒足以考古，亦以存唐宋之戏曲也。”^③王国维之后，戏曲史家几乎都把俳优的言行作为戏曲史的重要资料。

在研究戏曲史的过程中，王国维认识到戏曲是综合性的艺术，音乐、表演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对戏曲的本质和历史发展做出总体把握，他于 1909—1912 年间，先后完成了《唐宋大曲考》、《曲调源流表》、《录曲杂谈》、《古剧角色考》等著作。王国维从多种史籍杂著钩沉中探寻戏曲音乐、角色表演发展的轨迹，他所作的每一个结论都是严谨的，有根有据的。在《唐宋大曲考》中，他对“辞之可征者”，“可以旁证大曲者”，皆“收拾而存之”；并对大曲与舞蹈和搬演故事的关系做了详细的考证，最后得出结论说：“惟大曲一定之动作，终不足以表戏剧自由之动作；惟极简易之剧，始能以大曲

① 王国维：《曲录自序》（二），见《王国维戏曲论文集》。

② 《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 1957 年版。

③ 同上书。